

1920-1940年代莫斯科為中共 提供財政援助情況概述

• 楊奎松

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以下為敘述方便，在難以區分二者的情況下，將統稱為莫斯科)定期提供的經費援助開展活動，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據地，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定期獲得經費的情況雖然就此改變，但中共依據自身的實際需要，不定期地向莫斯科提出申請，進而獲得相應的財政援助的情況，卻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結束前夕。來自莫斯科的這種財政援助，無疑對中共自身的發展與成長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有關這種援助的具體情況至今卻仍舊鮮為人知。本文僅對此略作考察。

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依靠莫斯科定期提供的經費援助開展活動，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據地，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此後，中共仍不定期地獲得莫斯科的財政援助，並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結束前夕。來自莫斯科的這種財政援助，對中共自身的發展與成長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1920-23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早在中共一大正式召開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就曾經為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上海發起組提供過經濟上的援助。關於這方面的情況，2001年第12期《百年潮》雜誌所刊載俄國學者石克強(K. V. Schevelyoff)整理的一組檔案文獻，披露了其間的一些內幕。但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較為具體的中共取得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數目的資料，還是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報告中明確提到：「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10,000元，整頓印刷所1,600元，刷印品3,000元，勞動大會1,000餘元，其他約2,000餘元。」^①

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中共一大召開於1921年7月，而陳獨秀是1921年9月前後由廣州回到上海，擔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的中央書記一職的。故陳獨秀報告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時間，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開，即從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這一段時間。它並不意味着中共從1921年7月到10月之間沒有

* 本文是壓縮稿，全文將會在《二十一世紀》網絡版刊出。

黨費收入與支出。而從陳獨秀的報告中可以了解到兩點：(1) 這個時候中共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是包括黨的一般活動經費和工運經費在內的。相比之下，黨的一般活動經費的收支，僅為6,600餘元，而工運經費，亦即勞動運動方面的花費，則佔去了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的將近三分之二。(2) 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當中，自籌款數不足6%，只夠開一次「勞動大會」，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來自於「國際協款」②。

從中共二大召開之後，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的方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由於赤色職工國際也開始為中共提供一些財政援助，中共用於工運上的開支明顯減少了。這一點在中共三大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中和馬林 (Hendricus Sneevliet) 檔案裏，都有明顯的反映。在馬林檔案中不僅可以看到張國燾、蔡和森、陳獨秀於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別簽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當年也在中國流通的所謂「鷹洋」)、2,940港幣，及兩個3,000中國元的收條，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職工國際在1923年5月即開始與共產國際一同向中共匯款3,500美元，用於幫助中共、救濟受到中國政府迫害的同志等。故陳獨秀在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所提到的經費支出，沒有提到在黨的工作中佔據最大份額的勞動運動的開支，似非偶然。報告稱：「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15,000，其中1,600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③在這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 與上一年度的情況相比，黨費的支出中原先佔三分之二的勞動運動的開支幾乎不存在了。(2) 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8、9兩個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也不超過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實際上已經達到1,250元，較上一年度有明顯的增長。

陳獨秀的報告沒有提到工運費開支的情況，並不意味着在二大至三大期間中共所從事的勞動運動已減少到無足輕重的地步，沒有單獨列項提及的必要。事實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間，中國的工人運動相當活躍，而北方的工人運動尤其受到中共的影響。像著名的「二七」大罷工，就發生在這個時期。儘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職工國際提供援助的具體資料，但僅在並非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的馬林的檔案中，也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陳獨秀報告中沒有提到的俄國人援助的工運費用的記載。這包括：(1) 1922年11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全權代表越飛 (Adolf Joffe) 為唐山罷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準備進一步籌集的400元。(2) 1923年「二七」大罷工發生後，俄國鐵路工人捐贈給中國京漢鐵路工人受難者家屬3萬盧布。(3) 1923年3月赤色職工國際為中國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提供了1,000金盧布。(4) 1923年5月莫斯科經由北京轉交中共278英鎊，要求三分之二用於組織中國的工人運動和即將召開的勞動大會。(5) 1923年5月赤色職工國際交給中共中央2,000金盧布用於幫助中國的工會組織。(6) 1923年7月莫斯科匯款1,840墨西哥元，說明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者家屬④。

綜合這一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已知的情況，可以了解的是：(1) 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額度、途徑和方式都不固定，有時甚至會出現混亂。如共產國際執委會確定給中共的預算僅為每月1,000金盧布，事實上共產國際的撥款經常超過此限額，以致其代表經常會弄不清楚莫斯科寄來的錢是做甚麼用的，應該給

一大時期，中共在勞動運動方面的花費，佔去了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的將近三分之二。全部經費當中，自籌款數不足6%，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來自於「國際協款」。中共二大召開後，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的方式發生變化，中共用於工運上的開支明顯減少，而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較上一年度有明顯的增長。

在二大至三大期間，由於各地黨員得到的生活費不一，難免會引發黨內矛盾。如湖南的黨組織「有些同志指責其他一些同志，說甚麼他們從莫斯科拿了錢而且生活得不錯，但不關心別人」。馬林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信中說，中共數百名黨員中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

中共多少。共產國際在華全權代表利金 (Leakin) 更抱怨說：「國外工作的撥款無論在我以前還是我在 (莫斯科) 之時都沒有完全明確的計劃」，而且數額經常變動不定。「例如，朝鮮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在中國工作的條件下，這種波動就會造成直接有害的影響」^⑤。

(2) 由於各地黨員工作境遇不同，得到生活費的情況不一，因而難免會在黨內引發矛盾。如湖南的黨組織「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得到的援款自然很少，結果那裏的「有些同志指責其他一些同志，說甚麼他們從莫斯科拿了錢而且生活得不錯，但不關心別人，等等」^⑥。(3) 由於人員增多，辦公、交通及生活開支明顯增加。根據保存在馬林檔案中的一項1922年下半年的中共月開支預算表，即不難了解到這種情況。在總計660元的勞動運動月預算中，人員工資一項已達到370元。在總計1,200元的出版宣傳費用月預算中，人員工資一項已達到610元，租房一項也達到110元。而在總計不過170元的辦公費用中，交通費一項就達到100元。由此不難看出，隨着中共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其經費需求也必然會相應地增長起來，從而不可避免地會與共產國際發生矛盾。馬林在中共三大結束之後，就表明了他的擔憂。他寫信告訴共產國際執委會說：「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4、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⑦

馬林的擔心一時難以找到解決辦法。儘管馬林就此專門在中共三大上提出過批評，並與陳獨秀等人進行過談話，但是現實的狀況一時難以改變^⑧。

二 1924-27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1924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數額，陳獨秀在1925年4月9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有過具體說明。由於篇幅關係，這裏僅列出其關鍵的數字：

1924年1月至6月的預算：(一) 收入總額：800美元和10,174.93元^⑨。(二) 支出總額：300美元和9,341.366元。收支相抵尚餘520美元和833.064多元。

1924年7月至10月的預算：(一) 收入總額：14,510.0164元。(二) 支出總額：12,053.234元。收支相抵尚餘2,456.93多元。

1924年11月至12月預算：(一) 收入總額：740美元和8,242.225元。(二) 支出總額：6952.17元。收支相抵尚餘552.055多元。^⑩

陳獨秀在1925年3月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曾經提到，共產國際此前批准的黨費為每月2,250元^⑪。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產國際實際提供的經費要大大超過預算的數字。但由於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時常延誤，中共中央仍舊經常處於入不敷出的情況。1924年9月上旬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信中就曾對此頗多抱怨，說：「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面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7、8、9、10月份的錢來。」^⑫在他看來：共產國際不僅不應再拖欠經費，而且應當增加原有的預算，將月費2,250元提高到月費3,650元的水平^⑬。

中共四大召開於1925年1月。在四大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經費預算一時間並沒有加以調整，但隨着赤色職工國際從1月份正式開始提供援助，從2月份開始工運費已單獨預算，因此整體上黨的活動經費明顯增加了。以2月兩項經費之和3,226元計算，可以看出中共所得月經費額已超過上一年度月經費的平均額了。

1925年，是中共組織發展發生重大飛躍的一年。由於中共成功領導了「五卅」運動，其影響前所未有地擴大起來，以致黨員的數量從中共四大召開時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達到了上萬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開時，更達到了近六萬人的規模。從一個數百人的小組織，發展到上萬人的革命黨，共產國際原有的預算無論如何都跟不上形勢了。因此，進入1926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經達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使如此，也仍然無法滿足中共組織發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〇」事變的發生，使得加大對中共資金援助的力度問題變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來了。5月2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甚至通過了要「想方設法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資金援助」的正式決定^④。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對此更是再三呼籲，「堅決請求，根據中央的要求給中國黨增加預算，即從每月6,000盧布增加到14,000盧布。」^⑤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和維經斯基等人的呼籲發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帳單上我們可以發現，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經費預算已經達到了1.2萬元。赤色職工國際和青年國際還有單獨的預算幫助中國的工人運動和青年團組織。但是，隨着1926年7月北伐戰爭的開始，中共組織的發展和工作推進的需要，變得更加迅速和難以預測了。於是不僅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國際要向中共提供工運費和青運費，農民國際和濟難國際^⑥也一度開始專項提供農運費和濟難費。再加上軍事工作的全面展開，聯共(布)還不得不委託蘇聯軍事當局設法提供兵運費。為應付頻繁出現的意外事件，共產國際還通過專項撥款給在華的共產國際代表一筆特別費。進入到1927年以後，隨着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舉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國共關係全面破裂後中共轉入地下並在全國範圍進行武裝暴動，大小事件頻繁演出，整個經費援助的情況自然也就成了一筆糊塗帳。

下面僅據已有的資料說明共產國際為幾次重大事件提供資金的情況：

(1) 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據上海區委檢討第二次(2月22日)武裝暴動的情況時談到，此次暴動經費約支出2,470元，實際花掉1,789元，餘671元。據特委會報告稱，為第二次武裝暴動，曾準備用3,000元活動海軍，僅花掉1,000元。在準備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過程中，據上海區委報告，曾向俄國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國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國民黨人提出援款要求，國民黨人則同意給罷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萬元。

(2) 開辦黨校。經莫斯科批准，決定在漢口辦黨校，開辦費4.97萬元，月費預算為1.42萬元。

(3) 湖南農運。7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同意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3.95萬元。

(4) 轉入地下。8月9日，鑑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要單獨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發生危險。國際代表為此撥款1,000元。

(5) 秋收暴動。8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並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秋收暴動預算「至多不可超過滬鈔一萬元」。

1925年是中共組織飛躍發展的一年。由於成功領導了「五卅」運動，黨員人數從數百人發展到上萬人，共產國際原有的預算無論如何都跟不上形勢了。雖然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經達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但仍然無法滿足中共組織發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〇」事變的發生，使得增加對中共資金援助的問題變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後，中共組織的發展和工作推進變得更加迅速。於是，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國際、農民國際、濟難國際，甚至蘇聯軍事當局都設法向中共提供經費。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國共關係全面破裂，中共轉入地下並在全國範圍進行武裝暴動。1927年8月以後，每月經共產國際聯絡局提供給中共的費用，平均應在兩萬元左右。

(6) 建立軍隊。8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批准軍事總顧問加倫(Vasilii K. Blyukher)關於組織南昌暴動，然後南下佔領廣東汕頭，接運蘇聯武器，以便裝備一個軍的提議。為此，在已向蘇聯駐武漢總領事和軍事顧問加倫送款30萬美元之後，會議決定：還應「為此目的撥給15,000枝步槍、1,000萬發子彈(算在庫倫儲備物資帳上)、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帶2,000發炮彈，總金額110萬盧布」。

(7) 為將已經送去庫倫接受過軍事或政治工作訓練的41名中國學生送往廣東，加強南昌暴動部隊的骨幹隊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為把他們送回國去撥款4,000美元。

(8) 京漢粵漢鐵路罷工。9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並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由林育南帶去給岳州以南至安源的罷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漢口)的罷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濟。初步計劃：平均一個工人6元，堅持一個月。

(9) 北方暴動。10月，共產國際代表未經中央同志，單獨匯給北方局3,000美元用於組織暴動，後又寄出4,500美元。

(10) 緊急會議。11月，為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預算。

(11) 廣州暴動。據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報告稱，從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總計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已為廣州暴動用去了近10萬元^①。

除上述重要事件的專項撥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經費援助情況亦可扼要列舉如下：

(1) 5月26日，青年團中央書記報告稱：共產國際原定每年2.4萬元的預算已取消，青年共產國際決定每三個月提供經費7,000元。中共中央書記報告稱：黨的預算，連同特別費，只能有1.5萬元。

(2) 8月，鑑於國共關係破裂，蘇聯對國民黨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覆開會討論以後的預算問題，從最初提出總的預算每月8.2萬元，後減至4萬到5萬元，強調一定要細細地與共產國際代表核算。同時也要求黨員要自己謀生活，組織部要切實收黨費。據組織部長報告稱，自籌黨費估計或可有3,000元。

(3) 9月6日，共產國際為中共撥款17,128美元。

(4) 9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報告，已與濟難國際代表商定：濟難國際每月提供兩湖地區1,500元，江蘇2,000元，廣東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轉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應請濟難國際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濟難國際1928年初為1927年後3個月實際撥款1.9萬美元。

(5) 11月17日，因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困難，中共中央決定黨費月預算仍維持1.2萬元，中央7,000，各省5,000，工運費和特別費單列。

(6) 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預算為5.5萬元。但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談判未果。

(7) 除非正常性開支外，共產國際在1927年預算內的撥款總數為187,674元^②。

從以上可以了解到以下幾點：

(1) 1927年共產國際提供的黨費一項，每月平均當不超過1.2萬元。連同特別費，中共中央每月從共產國際執委會得到的款項平均在1.5萬元左右。但加上濟難費等，特別是到8月以後，每月經共產國際聯絡局提供給中共的費用，平均應在2萬元左右。

(2) 1927年幾乎整整一年中國革命的急劇動盪，造成了共產國際臨時性開支大幅增長，中共依照正常預算開支也全無可能，再加上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共產國際、濟難國際、農民國際，以及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等相繼介入，因此這一階段的財政收支已難有確切的統計。

(3) 由於這一年重大事件頻出，受難者眾多，故濟難國際的援助力度極大，且已形成定期撥款。

(4) 自8月以後，因國共關係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艱危，並成為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唯一援助對象，因此，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經費援助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掌控金錢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意見分歧。為此，雙方均對現狀表示強烈不滿。中共中央領導人明確批評說：「他們不相信中國黨」，「管錢管得非常糟」。共產國際援助中共的經費，中共中央應有權自己進行分配，而不應交給共產國際代表掌握，共產國際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個懂財務的人來擔任會計。但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卻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的作法。他在給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的信中寫道：現在的情況非常不好，由於共產國際的撥款不是從一個渠道進行的，因此在中共黨內造成了極不健康的現象。「迄今為止，黨通過國際聯絡局每月收到大約2萬墨西哥元，但這項預算被認為是不完全的，中央以各種理由請求我們為這樣或那樣的事情撥給或多或少的款項。而且幾乎為每件小事都提出請求。」^⑨

自國共關係破裂，中共，對共產國際經費援助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掌控金錢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意見分歧。中共中央領導人明確批評說：「他們不相信中國黨」，「管錢管得非常糟」，認為自己應有權分配共產國際的援助經費，而不應交給共產國際代表掌握。但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卻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而且幾乎為每件小事都提出請求。

三 1928-31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1928年的情況又如何呢？在4月3日的信裏，共產國際聯絡局負責人皮亞特尼茨基(Iosif Piatnitsky)說明了上半年向中共、日共和朝共撥款的情況。在談到對中共的撥款時，他提到：第一季度應撥給他們25,641美元；第二季度每月撥給他們12,820美元。同時撥給中國共青團7,692美元作為整個上半年的經費，而青年共產國際亦資助給中國共青團10,256美元^⑩。在這裏，給中共的撥款頭兩個季度合計應為38,461美元，平均每個月約為6,410美元。給共青團頭兩個季度的經費合計為17,948美元，平均每個月約為2,991美元。

在8月10日的信裏，他說明了共產國際下半年給中共、日共、朝共撥款的情況。具體到給中共的撥款是：下半年經費128,205美元；給中國共青團第三季度3,653美元、第四季度3,666美元，及支援款5,128美元。同時依照商量好的預算，以濟難國際的名義撥給中國黨上半年的經費2.73萬美元，撥給廣州專款8,000美元，撥給廣東和漢口專款各1,000美元^⑪。給中共的撥款平均到每個月，應為21,367.5美元；給共青團的撥款平均到每個月應為2,074.5美元。而從另一則文獻中可知，1928年度濟難國際提供給中共的濟難費，上半年每月為6,000美元，7-10月每月為9,000美元，合計為7.2萬美元，加上通過在國際上開展募捐運動所募集到的5.9萬美元，僅濟難國際提供的經費在頭十個月就達到了13.1萬美元^⑫。

注意到這時美元兌中國元的比價約為50：100，可知中共上半年每月可得經費1.28萬中國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經費4.27萬中國元左右；共青團上半年每月可得經費5,892中國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經費約為4,145元。

1928年中共中央先後派代表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的執委會強烈呼籲給予援助。在他們看來，正是由於經費不足，才導致近半年來黨的許多負責同志相繼被捕殺。因為當時黨中央委員每月只能得到27元，不僅不能有效地掩護自己，更無法在被捕後實施救援。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最終同意為中共增加撥款，折合中國元，平均每月已超過6萬元。

192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共產國際撥款數量所發生的這種變化，顯然與中共中央的反覆要求和新一屆代表大會的召開有關。已知5月和6月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代表曾幾度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和赤色職工國際執委會強烈呼籲給予援助，並提交了新的預算。在他們看來，正是由於經費不足，才導致近半年來黨的許多負責同志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槍殺。因為就連黨中央委員每月也只能得到27元，不僅不能有效地掩護自己，更無法在被捕後實施救援行動^②。由於中共中央這時提出的經費預算過於龐大，超出共產國際聯絡局權力所及，因此共產國際的反應只是迅速與濟難國際和聯共(布)政治局協商，然後通知其駐中國代表，準備再為中國黨撥款1.4萬美元，並由蘇軍參謀部第四局另撥3.5萬美元，用於救濟項目^③。然後，把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那個雄心勃勃的預算送給了斯大林去決定。

斯大林沒有輕易地否定中共中央的新預算。為準備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提供了大約10萬盧布之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據斯大林的建議，於6月14日一次撥出9萬盧布給中共應急。共產國際因此電告中共中央稱：3個月內可增加黨費9萬元，約合4.6萬美元，濟難費三個月也可增加1.2萬元。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時決定成立委員會來審查中共以往的收支情況，以便確定對中共中央所提預算的態度^④。委員會研究的結果，最終同意為中共增加6個月的預算。比較原計劃上半年撥款12.5萬盧布，聯共(布)政治局正式決定下半年給中共的經費可增至34萬盧布^⑤。折合中國元，平均每月已超過6萬元。

1928年下半年的預算沒有能夠在1929年得到繼續。由於聯共(布)成立了預算委員會，對中共以往的收支情況進行反覆審核的結果，是決定要適度削減給中共的經費。決定：「撥給205,128美元，扣留百分之三用於黨在這裏的開支和東方出版社方面可能的支出……剩198,974美元，可以分四次撥出(每三個月撥一次)。」對中國共青團1929年度預算的決定是：「每季正式預算4,120美元，一年16,408美元。此外，還將有援助款項。第一季度可以給援助款5,128美元，以下季度的援助款額另告。」^⑥由此可知中共1929年每月得款應為16,581美元，以1929年的最高兌換價，應可折合中國元約為3.68萬元；共青團每月得款約為3,080美元，折合中國元約為6,844元。比較1928年下半年平均月預算6萬元的水平，這個數字無疑對中共的觸動極大。

還在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得知了共產國際決定削減自己經費到每月3.3萬元的消息。12月26日，中共中央為此專門致信共產國際主席團稱：中共經常費每月6萬絕不能減少，且應提供兵運費每月2.4萬元，特別費年預算也應達到100萬元^⑦。當然，中共中央也注意到自身的問題，開始嚴格進行徵收黨費的工作，要求每月收入20元以下者要交5個銅幣，30元以下者交2角錢，60元以下者交3角錢，100元以下者交5角錢，收入在100元以上者要特別徵收。同時則檢討過去經常不照預算開支，導致虧空現象嚴重的問題，決定今後嚴格照新預算開支，各省1.9萬元不變，宣傳部由2,300元壓縮為2,000元，特科由3,600元壓縮為3,000元，給共青團的補貼減少到1,000元，交通費保持4,000元，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領導人的生活費均減少2元，原有的娘姨費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但無論怎樣節約開支，黨的經費仍然存在很大的空缺。新任總書記向忠發不能不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乃至斯大林本人發出呼籲。他一方面告訴共產國

際執委會說：「我們收到了關於削減我們預算每月達33,000中國貨幣單位的電報。考慮到中國的條件要求有更大一筆款項，我們打算再次申明我們的理由，請求增加預算。」另一方面則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寫信給斯大林，明確提出：駭人聽聞的白色恐怖遍布整個中國，我們的處境異常艱難。六大之前工作人員的損失已經相當嚴重，六大之後被殺被捕的人數更大大增加，六大新中央開始工作不到半年時間，其組成人員就有三分之一多被殺被捕。最近兩個月，包括滿洲、直隸、河南、山西、陝西、山東、湖北、福建、浙江、廣東、湖南等總共21個省的省委被國民黨摧毀，一些省委的全部工作人員都遭到殺害。基層黨組織的情況自然更加糟糕。但就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卻突然減少了我們的預算。「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的話，那我們就無法開展工作了，我們在黨內的基礎會更加薄弱。」^⑳

中共中央的要求並沒有很快地得到反應。共產國際聯絡局的代表明確認為由於在撥款的操作上存在一些問題，才導致中共中央對1928年下半年預算的增加產生了誤解。他們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報告稱：中共中央多半是把去年按月撥給他們的那用於救急的46,000美元連同定期撥款的數額算在一起，當成是正常撥款了，因此才會認為今年的撥款少了。當然，他們也承認，濟難國際1929年撥給中共中央的款項比應撥給他們的少了一半，這對中共中央產生了壓力，因為幾乎每個黨多餘的錢大都是從濟難國際的錢裏挪用的^㉑。

但很明顯，凡是在中國的共產國際工作人員都不會認為1929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是合理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代表雷里斯基(Lerisky)就坦言：他不理解共產國際執委會為甚麼要削減中共的經費。他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寫道：「他們的經費是不足的。他們有18個省，走一趟要花很多錢。他們有紅軍。他們出版四個機關刊物，印製大量傳單。我們不講應由誰提供資金，他們應該弄到自己的經費，但暫時還沒有這個能力。沒有錢就會影響工作的開展。無論如何我想像不到會減少他們的預算。」^㉒

雷里斯基的質疑不僅沒有得到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理解，直接參加預算委員會的皮亞特尼茨基反而明確告誡雷里斯基不要干預經費問題。然而，眼看中共的經費不僅得不到增加，而且還因為貨幣貶值在進一步減少，特別是注意到共產國際聯絡局的代表為控制中共的開支，竟將每月的經費分成十次，即三天一次小額付給，雷里斯基忍不住還要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寫道：儘管指示我不應干預經費問題，「但我仍認為有義務提及這一問題。現在在當地那裏只付給中國同志3.3萬元。過去付這3.3萬時美元比價為2.2元，而現在付這筆款項時美元比價已為2.8元(2月)，換句話說，黨的預算由於貨幣貶值削減了近30%。」如果說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削減了，而且還故意要每隔幾天發放一次，這已經給中共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和損失，那麼濟難國際經費不能按時到達，所產生的影響就更加明顯了。因為，濟難國際在1929年頭三個月幾乎沒有送來一個戈比。4月之後經過長時間交涉，到後來也只收到了幾千元。8月份以後濟難國際答應寄來1.8萬元，結果一直拖到11月。11月又藉口中國的濟難會還有3萬元儲備，只給了它6,000元，12月只給了3,000元，1930年1月也只給了3,000元，2月負責撥款的代表乾脆告訴中國同志說沒有收到濟難國際的錢^㉓。

進入到1930年，隨着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迅速發展，共產國際開始有了新的藉口。他們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設法從紅色區域通過打土豪等辦法，去獲得經

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得知共產國際決定削減援助經費為此專門致信共產國際主席團稱：一方面絕不能減少經費；另一方面，開始嚴格進行徵收黨費的工作，並檢討過去導致虧空的嚴重問題；決定今後嚴格照新預算開支，如各省1.9萬元不變，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領導人的生活費均減少2元，取消原有的娘姨費，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費。並且因為自身經濟上的問題，通知中共中央5、6兩個月將停發經費。這種情況不能不進一步引起中共中央的強烈不滿。它在5月18日再度直接寫信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提出了申訴。

在給斯大林的信中，他們在重申了經費不及時、不到位、小額撥付無法分配，以及金價上揚，繼續照跌價後的墨西哥元付款，月收入與預算相比減少30%等情況之後，明確告訴斯大林：不能指望來自蘇區的幫助，因為紅色區域提供的支持不僅不經常，而且根本不能滿足工作的迫切需要^③。

1930年夏，斯大林確定了重點發展蘇區和紅軍的方針，要求中共中央開始把工作重心向農村轉移，為此他重新關心起中共的經費問題來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皮亞特尼茨基8月間分別會見了即將回國的中共代表周恩來，保證經費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圓滿解決。然而事實上，當周恩來於8月下旬回到上海之後，發現情況並沒有好轉。周回國後馬上就向共產國際聯絡局駐上海的全權代表馬克斯(Max)說明了上述情況，沒想到馬克斯告訴周說：經費沒有給夠，這是事實。但共產國際的經費很大程度上要靠將倉庫裏的貨物變賣換取現金才能支付，而現在倉庫裏積壓着價值14萬美元的貨物賣不出去，自然不能很快支付中共的經費。周恩來難以理解共產國際經費變成商品的這種情況，要求馬克斯設法解決這一問題，馬克斯答覆稱：「如果共產國際每個月都寄給我新的經費，即固定的月津貼，那麼我就可以支付舊的欠款。」但隨後中共中央很快就了解到，要指望馬克斯把庫存的貨物賣掉來付清拖欠的經費，短期內完全沒有指望，況且共產國際即使給馬克斯寄來了經費，他也出於生意上的需要沒有照約定拿它來如數支付給中共中央。

1930年隨着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迅速發展，共產國際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設法通過打土豪等辦法獲得經費。這引起中共中央的強烈不滿。1930年夏，斯大林確定了重點發展蘇區和紅軍的方針，要求中共中央把工作重心向農村轉移。為此他重新關心起中共的經費問題來了，並會見了周恩來，保證經費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圓滿解決。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此不能不再度直接寫信向斯大林、莫洛托夫(Viacheslav M. Molotov)和皮亞特尼茨基投訴。它在信中告訴他們：從2月份到9月份，共產國際一共少支付給中共17.97萬墨西哥元。10月份共產國際寄來2萬美元，馬克斯卻只支付給中共中央不到1萬美元。共產國際遠東局對此也深表同情。它於10月下旬接連致信皮亞特尼茨基指責馬克斯，稱：「財政混亂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造成了黨、共青團、甚至工會整個工作的混亂」，甚至使遠東局的工作也處於癱瘓狀態。周恩來——這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如今也變得焦躁不安了。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你們在這裏自作聰明地說：請出版報紙、呼籲書，請派人到蘇區去，請組織蘇維埃代表大會等等，可是我們卻沒有一分錢，用來招待來上海辦事的人。我們失去了許多人(如在漢口的軍事工作者)，只是因為沒有錢租用住宅！」十分明顯，遠東局強烈地批評說：「中國的政治局，由於不能按期收到經費，也不知道明天是否會收到和能收到多少，就到處奔波，開始向私人借債，最後為了黨的需要經常要花工會的錢。政治局一些優秀的委員不去做政治工作，卻花費整天整天的時間咒罵我們，並為了黨的某種需要而到處找門路去弄幾個美元。」^④

因為不能按照預算支付經費而使斯大林向蘇區和紅軍大量派遣工作人員的工作受到阻礙的情況，就連按照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前往上海就近幫助制定聯絡和指導蘇區與紅軍辦法的蘇聯軍事工作人員小組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以蓋利斯(Karl Gailis)為首的這個小組到達上海，並進行了數周的工作後，就直截了當地致電第四局負責人別爾津(Bilkin)要求匯款。蓋利斯指出：「黨的財政

狀況非常嚴峻。他們從莫斯科得到的預算不能保證完成現有任務。」要想指望紅軍把蘇區裏面一些值錢的物品拿來變成現金，在目前的條件下幾乎行不通。黨現在比任何時間都更需要錢。因為黨如果不掌握一定數量的資金，培訓人員和派遣他們去蘇區是絕對辦不到的。「在黨現有資金的情況下，只能偶爾派遣個別一些工作人員，根本談不上派遣大批工人。派遣一名工作人員需要花費200到240墨西哥元，用於購買食品、車票等花銷。」現在必須要花錢來「建立通往蘇區的固定路線、向蘇區派遣人員、寄發指示等。在這方面迄今為止都以手工作業方式進行工作。人員派去了，但是在他們出發後，誰都不了解他們的情況。他們中一部分人失蹤了，一部分人在路上耽擱好幾個月，而到達的人員也無法報告甚麼。在與護送站沒有建立固定的路線之前，軍隊的工人化、指導人員的派遣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紙面上。中央沒有錢，周恩來特別請求我向你（他不認識你）提出這個問題並給他們以幫助。我們局認為有必要幫助他們，因為中國人的經費狀況的確不好。他們不能經常收到從共產國際方面寄來的錢，而開支卻很大。舉例說吧，印刷所被搗毀了，要建立一個新的印刷所需要1萬墨西哥元（3,000美元）。劉雲犧牲了，主要是他沒有錢租用住宅。」在目前的情況下，「當一切勢力為了消滅我們而動員起來圍剿黨和蘇區的時候，應該通過發放一次性補助金的辦法去幫助中國人。」為了瓦解軍閥部隊、建立固定的路線和聯繫、向蘇區派遣人員等目的，至少應當匯來10萬美元作為一次性補助金^⑤。

得知這種情況後，斯大林顯然對皮亞特尼茨基的工作提出了批評。這導致皮亞特尼茨基不得不找其下屬算帳。在收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遠東局的申訴信後，他馬上寫信給在中國上海長期負責為此撥款的馬克斯，指責他自作主張地將錢投入了企業，沒有按照市場的比價向中共支付金美元，等等。這位代表也非常委屈，他抱怨說：他在中國工作了三年之久，從未聽到過皮亞特尼茨基提出甚麼意見，這意味着他過去的工作沒有問題。而把大部分的款項變成商品運到上海來，爭取將本來是用於掩護的假公司確實變成一個企業，也是皮亞特尼茨基同意的。至於沒有能夠按照預算支付給中共經費，多半也是因為莫斯科寄來的錢不夠，且明令其「每月支付1萬金美元，並把整個款額壓縮到10萬金美元」，並非他個人的作為。但無論如何，馬克斯還是逃脫不了自己的責任。由於他和聯絡局之間就整個公司的運轉問題並沒有留下任何文字上的記錄，他自知自己將會成為這種局面的犧牲品^⑥。

馬克斯被調離之後，中共得到共產國際的撥款變得順利多了。儘管共產國際依舊沒有增加對中共的經費，仍舊是每個月1.5萬美元，但再不用墨西哥元付款了，中共中央也用不着幾天一次跑去領取那些小額現金支票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1年的整個上半年。在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後的自供狀中，他的供詞也清楚地記述了共產國際經費沒有變動的這種情況。他寫道：「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美金，（相當於）中國五六萬元。」^⑦值得注意的是，在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由於經費問題而發生的爭論已經幾乎見不到了。這裏面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整個中共的工作重心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已經發生了轉移，即六成以上的幹部和工人骨幹被派到蘇區和紅軍中去了。再加上羅章龍等工會幹部另立中央，中共發生嚴重分裂，其城市工作自然大為收縮，機構和人員都大幅減少，所需各種經費自然也

由於不能按照預算支付經費，使斯大林向蘇區和紅軍大量派遣工作人員的工作受阻，就連聯共（布）中央派往上海的蘇聯軍事小組工作人員都深切感受到了。他們致電莫斯科指出：「黨的財政狀況非常嚴峻。他們從莫斯科得到的預算不能保證完成現有任務。」為了瓦解軍閥部隊、建立固定的路線和聯繫、向蘇區派遣人員等目的，至少應當匯來10萬美元作為一次性補助金。

就相應減少了。第二是與蘇區和紅軍的聯絡線在蘇聯軍事工作人員小組的指導下建立起來之後，蘇區與中央之間的聯絡開始變得暢通起來，結果中共中央很快就從紅軍那裏得到了幾十萬銀元^⑧。這意味着，中共不再完全指望從共產國際那裏取得經費支持了。隨着1931-32年間中共中央機關接連遭到破獲，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被迫分別離開上海前往蘇區或莫斯科，中共中央最終甚至完全遷去了江西中央蘇區，來自莫斯科的這種固定的經費支持也就自然而然地中止了。

四 1936-37年莫斯科提供財政援助的情況

隨着1931-32年間中共中央機關接連遭到破獲，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被迫分別離開上海前往蘇區或莫斯科，中共中央最終甚至完全遷去了江西中央蘇區，來自莫斯科的固定經費支持也就自然而然地中止了。被停發的經費，相當部分被用來建立了一個「中國基金」。1935年，共產國際曾動用這個基金援助「中華民族革命同盟」。

定期經費援助的停止，並不意味着來自共產國際的一切形式的資金的或財政的援助從此就都沒有了。被停發的經費，相當部分被用來建立了一個「中國基金」。這個基金的建立，無疑便利了專項援助經費的提供。由於文獻資料的欠缺，目前尚無法弄清在1933-34年間除了人員培養、輸送等方面的撥款以外，這個基金發揮過怎樣的作用。1935年，共產國際動用這個基金所做的最大的舉動，似乎只有援助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人重建十九路軍的努力。當時，這些福建事變的發動者向莫斯科求援，並以「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名義與中共代表團展開了合作談判。在共產國際新任總書記、直接負責中國事務的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親自過問下，共產國際表示可以考慮按照雙方所達成的條件從中國基金中向「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撥款。「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這時要求的資金援助包括：提供10萬元訓練軍事幹部；提供20萬元購買兩千枝步槍；提供10萬元用於各項軍事開支；提供4萬元用於「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各項開支，等^⑨。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態度前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陳銘樞等人的條件未被接受。最後，中共代表團只向「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提供了大約2萬美元^⑩。緊接着，由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把統戰工作的重心轉向了南京政府，這一合作過程未能繼續下去。

在1934年夏天之後，莫斯科就與中共中央和中共在各地的武裝力量失去了聯繫。在這種情況下，向中共提供援助自然沒有可能。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終於在陝北建立了一台可以用來接通與莫斯科電訊聯繫的大功率電台。在給其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的第一封電報當中，它就迫不及待地向後者說明了自己的財政經濟情況。電報稱：紅軍已經與張學良和東北軍建立了統戰關係，並準備發動抗日反蔣的西北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但是，東北軍月餉兩百萬元全靠南京，一旦發動反蔣即完全斷絕。陝西雖然物產較豐，但供給楊虎城部三萬人尚嫌不足，甘肅人口二百萬，稅收不足十萬元，紅軍所處的陝北地區更加困難。「請你們訊問國際能否每月幫助我們三百萬元。再則向美洲華僑及各國工人募捐有希望否？財政問題之外，軍火問題也是重要的。我們希望的是飛機、重炮、子彈、步槍、高射機關槍及架橋技術等，請訊問按政治情勢所許，可能幫助我們至何種程度？」^⑪

1936年8月下旬，由於莫斯科否定了紅軍與東北軍發動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計劃，要求中共把統戰的重心轉向南京政府，中共領導人不得不聯名電告王明轉電共產國際，陳說利害，請求援助。電稱：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

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目前陝北蘇區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如不能與東北軍聯合反蔣，南京國民黨一時又拒絕停止剿共，紅軍迫於生存的需要將不得不向較富庶地區發展。如此不僅將被迫放棄現有蘇區，而且將導致內戰大規模爆發。「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黃河)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②

剛一得到中共中央8月25日來電，斯大林就很快批准了軍事援助的方案。9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直接覆電中共中央書記處稱：「同意你們佔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的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與此同時，蘇軍開始準備經過外蒙古向中國紅軍提供將近600噸的軍事裝備和彈藥，包括1.5萬-2萬枝步槍、8門火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彈藥，要求紅軍主力經過寧夏前往綏遠定遠營方向進行接運^③。

莫斯科的來電無疑是一個讓中共中央和全體紅軍將領盼望已久的好消息。面對這幾乎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寧夏戰役計劃，並於9月14日先後通知了正在北上的二、四方面軍，要求後者與紅一方面軍密切配合，共同佔領寧夏，以接取國際援助。但是，這一作戰計劃由於南京政府中央軍推進過快，在10月下旬宣告失利。紅軍三個方面軍被分隔在黃河兩岸，各自為戰，軍事形勢更形艱危。特別是因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早已是靠向張學良借錢買糧以度日，如今二、四兩個方面軍又來到甘北，紅軍人數猛增一倍以上，糧食問題更難解決。而二、四兩個方面軍又來自溫暖的西南地區，部隊不僅全無過冬準備，甚至久經征戰之後，大部分戰士單衣和單鞋都已破爛不堪。甘北的冬天又來得格外早，11月初已經開始下雪，許多戰士倍受凍餓之苦，傷病者與日俱增。雖然這時求助於張學良和宋慶齡，紅軍解決了部分糧食需求，並得到了幾萬雙鞋子和一萬套冬裝，但不論糧食還是衣服，都還有一半以上的部隊沒有解決問題。故中共中央要求共產國際緊急寄送款項的心情極其迫切。這時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明確電告王明等：「請你們迅速地確實地將幫助我們的經費從天津、上海兩處交款」，「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否則，「你們多推遲一天，則紅軍的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④。

實際上，還在9月20日，共產國際領導人就已經開會討論了對中共提供財政援助的問題。季米特洛夫為此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寫了專門的報告，請求提供200萬盧布的貸款。經過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後，10月18日，共產國際就已經致電中共中央表明要從財政上來援助中共了。其電報稱：「我們準備向你們提供數目可觀的現金，以便你們能夠在國內自行購買必需的物品。」11月3日，注意到南京政府的軍隊與日偽軍將要在綏遠爆發戰爭，莫斯科在要求紅軍改向新疆接運軍事物資，並主動將援助物資的噸位提高到1,160噸的同時，也制定了專項撥款援助的計劃。1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通過王明和陳雲電告中共中央稱：「經濟上不能按月幫助，決定對你們幫助的總數五十五萬美元，第一批送去二十五萬。你們大約在11月底可以在你們指定的上海轉款人手中收到。」^⑤對此，中共中央已急不可待了。張聞天剛過了一周即致電王明等催促說：「因為沒有現金，糧食也買不到了。請即刻經過天津付款處送一筆款子來，

1936年8月下旬，由於共產國際否定了紅軍與東北軍發動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計劃，要求中共把統戰的重心轉向南京政府，中共領導人轉電共產國際，陳說利害，請求援助：如不能與東北軍聯合反蔣，紅軍迫於生存的需要將向較富庶地區發展，將導致內戰大規模爆發。斯大林很快批准了軍事援助的方案，蘇軍開始準備經過外蒙古向中國紅軍提供將近600噸的軍事裝備和彈藥。

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告共產國際書記處，提出黨在財政上的困難極端嚴重，連前線部隊開銷都不夠。因為沒有錢，缺少武器、擴軍困難不說，部隊挨餓受凍十分普遍，莫斯科應迅速提供經費援助。季米特洛夫十分重視，緊急同蘇共政治局領導人磋商，並同意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

以救燃眉之急。我們的交通正在那裏等候。上海方面也已通知小開(指中共這時的談判代表潘漢年——引者註)準備接收。」^{④⑥}至11月底，中共中央仍未收到來自天津和上海接收到共產國際第一筆匯款的消息，張聞天更是沉不住氣了，又去電訊問王明等：「你們答應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我們派人於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決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④⑦}

終於，來自共產國際的第一筆援款於12月初到達了上海，很快即轉送到甘北蘇區。隨後，經過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努力，共產國際還進一步擴大了援助的規模。據《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他在12月2日曾再度致電蘇聯政府財政人民委員會，要求在撥出200萬盧布之外，再提供50萬美元另5,000盧布給中共^{④⑧}。在與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覆交涉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於1937年3月2日頗為興奮地電告中共中央說：「我們為你們撥款80餘萬美元，這筆錢將送交給你們。另外，你們還能夠指望收到相同數目的另外一筆援助。只是轉交這些錢在技術上存在着極大的難度。但無論怎樣都必須確保實現這一轉交。」^{④⑨}不難看出，共產國際和蘇聯這段時間先後向紅軍承諾提供的援款數量應當在200萬美元以上，它對正處於危難中的中共和紅軍無疑有重要的幫助。

五 抗戰期間莫斯科提供財政援助的情況

抗戰期間共產國際從資金上援助中共的情況，過去最醒目的一筆是來自於關於王稼祥的回憶。回憶稱，王稼祥1938年從莫斯科回國時，曾經帶回30萬美元。經過研究者們多年的研究之後，如今這一情況已經被寫入正式出版的《王稼祥年譜》之中^{⑤⑩}。

依據現在已經公開和披露的檔案文獻資料，這樣的記錄看來還有不少。

1937年9月，潘漢年致信王明，轉達毛澤東和張聞天要求共產國際再度按月提供經費的請求。他在信中寫道：中共中央急需錢，因為有許多戰士犧牲在前線，而南京只提供了很少一點薪金。而且要把工作擴展到全國範圍去，也需要一筆數目適當的資金。因此，中共中央要求你們能夠繼續按月撥給經費^{⑤⑪}。而後，在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書記處又通過任弼時和王稼祥電告共產國際書記處，提出黨在財政上的困難極端嚴重，國民黨每月只發餉50萬中國元，合美元約16萬，連前線部隊開銷都不夠。因為沒有錢，缺少武器、擴軍困難不說，部隊挨餓受凍十分普遍。他們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經費援助，「最好是派飛機送來」^{⑤⑫}。這時在武漢的王明、周恩來等也通過延安轉電莫斯科，要求盡快得到財政上的援助，以便為部隊購買緊缺的各種槍枝彈藥。對此，季米特洛夫給予了高度重視，緊急同蘇共政治局領導人磋商。在2月17日的日記中，他就記下了他與斯大林、莫洛托夫談話後的結果：「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⑤⑬}

兩個月後中共中央重新又提出了援助請求。這一回是前往莫斯科匯報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向共產國際提交了新的求援信。信稱，目前有三批人員急需救助，一是從國民黨監獄釋放出來的近4,000政治犯，他們受盡折磨，健康狀況極差，要回到黨的隊伍中來重新工作需要治療和營養；二是數千

因傷致殘的紅軍人員；三是大批被國民黨殺害的烈士的遺屬以及當年留在蘇區失去了生存條件的紅軍親屬，以及現在在黨、政、軍工作的6,000家屬。任弼時寫道，目前黨只能保證各機關工作人員的簡單溫飽，抗戰後原定每人發一元至五元不等的補助金，也因經費匱乏經常發不出來，缺醫少藥更是家常便飯，毛澤東和朱德也不例外。因此，中國黨急需在物質上和醫療上得到蘇聯的幫助。

任弼時的求援信沒有列出要求援助的細節，只說明「隨後我們會向您提供具體的數字和資料」。莫斯科批准的援助數字還不得而知。但聯繫到7月份回國的中共代表王稼祥帶去30萬美元的援款，可以想像它或許會與這一情況有關。當然，對此也有另外一種解釋。那就是，因為任弼時這時還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了請蘇聯向八路軍提供一些武器的要求，季米特洛夫對此的態度是：「給八路軍武器援助，這要蘇聯政府決定，不過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這可能不是幫助了你們，而是害了你們。」因為這會惡化國共關係並為國民黨孤立和封鎖延安提供口實。最後，「共產國際從它的外匯中撥出三十萬美元送給中國共產黨」^⑤。

能夠看到的1938年中共中央另外一份要求援助的文件是12月30日的，那上面列舉了大量用於印刷的機器和其他各種用品的名稱。中共中央強調，這些物資對於八路軍在居民當中和在部隊裏開展文化宣傳工作是極端必要的。據當年在延安工作的人回憶，經過國民黨的同意後，蘇聯人確實把一批印刷機械送到了延安來。

在此之後的一份重要文獻是1940年2月23日的。這個時候周恩來正在莫斯科醫治臂傷並匯報工作，他顯然再度詳盡地匯報了中共在財政上所面臨的嚴重困難。季米特洛夫為此一面要求周恩來告訴中共中央，盡量動員所有國內的資源以解決困難，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來提交的預算表，說明他贊同周恩來的說法，強調周恩來提出的預算是可信的，每個月黨的經費的缺口為58,280美元，軍隊的缺口為30萬美元，他「認為可以在1940年向中國黨提供35萬美元的援助」。據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關部門下達撥款指示」。而斯大林的答覆很簡單：我很忙，「很多東西我未能讀完，請你們自行決定。我們將提供30萬美元的援助。」^⑥

1941年1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莫斯科與毛澤東之間圍繞着如何對待蔣介石國民黨的問題發生了爭執。但是，由於蘇德戰爭突然爆發，應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還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數目更大的一筆援款。據季米特洛夫在7月7日電告毛澤東稱：「援款(100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16日，季米特洛夫又寫信給莫洛托夫，說明這筆援款數額巨大，用途甚急，而由於國共關係惡化，蔣介石拒絕蘇聯飛機飛往延安，因此援款不能及時送到。他提議：「由於使中國同志盡快獲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們認為有必要採取非法手段用飛機經過蒙古發送經費。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這樣成功地做過。請求您指示潘菲洛夫用這種方式組織這次行動。」^⑦

來自莫斯科的經費援助和各種物資幫助，可以說從1937年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即使在共產國際於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後，這種情況事實上也還在繼續着。194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顯示，季米特洛夫仍在與蘇共政治局領導人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討論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的問題。這一年的12月7日，季米特洛夫還在向聯共(布)領導人轉達中共中央的援助請求，並提議幫助中共中央5萬美元^⑧。

1941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莫斯科與毛澤東之間圍繞着如何對待蔣介石國民黨的問題發生了爭執。但是，斯大林還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數目更大的一筆援款。據季米特洛夫在7月7日電告毛澤東稱：「援款(100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可以說，來自莫斯科的經費和各種援助，從1937年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

註釋

- ①②③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47；47-55；168。
- ④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近代史所合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98、151、154、168、169、173；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E. J. Brill, 1991), 347。
- ⑤⑥⑧⑩⑫⑬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85；318；316；593；529；593。
-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近代史所合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43。
- ⑨ 在這裏總收入額與單項收入之和不完全相符，以下內容中也有類似的情況。
- ⑩ 《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5年4月9日)。
- ⑭⑮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267；303。
- ⑯ 全稱應為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是用於援助各國因革命受難者及其家屬的一個國際性組織。
-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16-19、20、71；35、396；360-62；395；525；445-46；472；493；521。
- ㉗㉘㉙㉚㉛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8)，頁36；52；77、83-86；101-102；172。
- ㉜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信》(1928年12月26日)。
- ㉝㉞㉟㊱㊲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9)，頁78-79；157；400-402；416-17、479-81；429-32。
- ㊳ 轉引自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台北：正中書局，1965)，頁159-64。
- 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10)，頁280。
- ㊵㊶㊷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0,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7): 41-47; 48-50; 67.
- ㊸ 《中央書記處致王明、康生電》(1936年6月16日)。
- ㊹ 《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關於紅軍行動方針給王明同志電》(1936年8月25日)。
- ㊺㊻㊼㊽ 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46；48；64；107。
- ㊾ 《中央書記處致王、康、陳電》(1936年11月8日、9日)。
- ㊿ 《王、陳致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11月12日)。
- ① 《張聞天致王明、陳雲電》(1936年11月20日)。
- ② 《張聞天致王明、陳雲電》(1936年12月5日)。
- ③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1906-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190。
- ④⑤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0, no. 2 (March-April 1997): 10-11; 59.
- ⑥⑦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RPSDMH)*, 495/74/291; 495/74/317.
- ⑧ 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296-97。

楊奎松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